

人大国发院十大核心产品系列

# 政 策 简 报

2019年12月 第22期 总第72期

##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战略机遇期 2.0 ——从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的演化看新时期中国外部机遇特点

岳晓勇



—— 中国人民大学 ——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 人大国发院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中国人民大学集全校之力重点打造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现任理事长为学校党委书记靳诺教授，院长兼首席专家为校长刘伟教授。2015年人大国发院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并入选全球智库百强，2018年初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人大国发院积极打造“小平台、大网络，跨学科、重交叉，促创新、高产出”的高端智库平台，围绕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域，汇聚全校一流学科优质资源，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人大国发院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引领者”为目标，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坚守国家战略，秉承时代使命，致力于建设成为“最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智库”。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楼

网站：<http://NADS.ruc.edu.cn>



人大国发院微信

## 作者简介

岳晓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世情研究中心主任。岳晓勇博士曾任外交部政研室副主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中国驻美国使馆政治处主任和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等职，并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卡塔尔国、哈希姆约旦王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大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宁夏）外事顾问。岳晓勇博士长期从事外交实践、中国外交政策调研和国际关系及中国对外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及国际战略问题等。

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

媒体热线：张雯婷； 办公电话：010-62625159

---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

主编：刘青

编辑部主任：邹静娴

本期责编：邹静娴 张雯婷

## 摘要

目前，中国外部环境在中美关系方向有所趋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的国际机遇问题十分紧迫。本报告认为，中长期看，我国内部条件和外部形势的变化使我国发展的外部，风险有所增加，但机遇仍是主流，机遇和挑战并有，中国已进入战略机遇期 2.0。

我党十六大提出，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前 20 年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把这一段战略机遇期称作“战略机遇期 1.0”，那么，可以说中国现在进入新的机遇期是“战略机遇期 2.0”。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有效应对好新的更为复杂严峻难题风险的机遇期，这一重要判断最准确地概括了战略机遇期 2.0 的本质特点，即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同时这也是一个要与世界各国共创、共护和共享的机遇期。

战略机遇，关乎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说到底所涉及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抓住了战略机遇，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自身的努力与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升了中国实力，增强了自身在国际格局嬗变中的主动权与影响力。当前国际环境所发生的新变化，包括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西方民粹主义盛行、单边主义压力增大、国际治理问题突出、科技创新浪潮等，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面貌，中国外部环境的某些方面趋紧，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改变。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安全战略平衡基本维持、世界总体生产力持续提高、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更新继续发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将确保中国战略机遇期 2.0 不仅存在，而且可望通过斗争和团结奋斗维持较长时期。但有所不同的是，若战略机遇期 1.0 的主要特征是以中国全面进入世界市场和联接国际规则为背景，通过深入推进加强参与和适应全球化竞争来用好机遇，战略机遇期 2.0 的最大特征则是以中国已处在世界舞台中心和全球化发展潮流之中为背景，通过斗争、周旋和合作，与各国共创、共护和共享机遇，促进国际治理和共赢合作，战胜新挑战，特别是更有力地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为此，中国在新的战略机遇期要更冷静地把握自身力量、与国际社会的融合度和外部压力同时增加的特点，处变不惊，在发展中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聚焦自身战略目标与任务，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强化国家

治理和全球治理能力；加大对人才的重视、培养与使用；以“一带一路”为牵引，加强全球合作共赢；强化重大国际力量运筹的同时，增加对弱势国家或国家群体的关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我所用。

## 一、当前对中国外部形势的分析有三种趋向性看法

一种过于简单地看待我国的机遇、优势和长处，对挑战、风险和困难估计不足；另一种过于悲观，认为消极因素太多且在继续增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正在明显减少甚至消失，出现战略疑虑；第三种则认为我国的战略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仍是主要的，但挑战中蕴含机遇，机遇里潜伏风险，为此要保持自信和定力，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

本报告倾向于第三种，并进一步认为，我们要以极大的战略洞察力和勇气看到实力不断发展上升的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新的战略机遇期也包含了多年发展变化所积累或激化的中国内部和外部矛盾与问题。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自身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增强，中国制度的优势进一步显现，同时外部对中国崛起的不适、焦虑和防范也在空前积聚和释放。因此，把握好战略机遇期 2.0，要强化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与用好机遇的意识，强化逆水行舟精神，处变不惊，高度聚焦自身的目标与部署，坚定前行，重点防范和挫败西方混水摸鱼、乱中促变或其他延缓和阻止中国的崛起步伐的阴谋。

因此，分析我国外部环境，要抓主要矛盾。战略机遇期本质上涉及的是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问題，要义是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和

发展面临的外部宏观条件，而不仅是短期或微观局部的情况。因此，应研究影响形势的基础性和全局性因素而非其他因素，更不是谈判博弈过程中简单的舆论运作或压力测试。

要深入理解战略机遇期 2.0，就要认真回顾战略机遇期 1.0 的形成与演进。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从战争不可避免和战争引起革命或革命导致战争转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导潮流，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当时，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以战略家的远见和气魄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了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开启了战略机遇期 1.0 进程。彼时的表述为美国和西方的主要矛头不可能集中对中国、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中国正成为世界多极化中的一极等。1979 年，我国实现了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深刻论断。2001 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 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将 21 世纪头二十年视为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对两个问题要有清晰认识：其一，就我国而言，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在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民中，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成为主导潮流，发动大战必将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反对唯武器论或唯技术论等；同时也要注意，多极化持续发展有利于全球力量平衡、遏制霸权主义和战争；经济全球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科技和产业革命有利于中国扩大开放、开展国际交流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市场广大，外交主张公道公正独立平等，对世

界各国维护和平发展有巨大的吸引力。

二战之后，包括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内，一些国家实际上早于中国认为国际形势大体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这些国家当时的处境与中国不完全一样，他们或处于冷战中间地带，不同程度地追随两个超级大国搞联盟对抗但又不愿意为超级大国利用而使自身火中取栗，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分析思路与中国也不完全一样，主要有三点：其一，美苏两个集团大体达到安全战略力量均势，上世纪 60 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说明，核大战没有赢家，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已成为共识。但此后国际局势一直紧绷在冷战阴影之下，美国和前苏联承担了冷战的主要压力，其他中间地带，特别是西欧和东亚一些国家依然得到了发展的良机。其二，在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上，认为世界总体生产力在二战后已基本达到满足人类生存所需资料的水平，消除了人类长期以来为抢夺生存资源而发动全球大战的可能性，发展领域的关注重点转向解决贫富差距和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联合国为此发起了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其三，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对战争产生“软性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现当代国际法否定战争作为国家对外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如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对非战原则明确肯定，公然发动侵略战争在道义上受到普遍谴责，在法律上是犯罪行为。

上述两种认识形势的思路有明显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在战略机遇期 1.0 时期，影响世界形势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和前苏联的关系互动，中国也有重要作用，但非主角，在两霸之间，我们作为较



弱的一方，战略上是被动反应式的。

战略机遇期 2.0 时期，这一局面会有很大的改变，但也有没有改变的地方：表面上看，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已“代替”前苏联，参与广泛的国际发展合作与竞争，成为全球力量战略矛盾的主要问题中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这一代替并非也不可能是全面置换。在核战略平衡上，中国不会也不愿意发起全球性军备竞赛；在科技、国际事务参与度以及国内国际治理能力上，中国与美日欧盟等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发展中国家特征很突出；但在与国际经济的融入深度上，中国又远远超过前苏联而与国际社会联结成生存、发展与繁荣的紧密共同体，且正在努力推动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命运共同体。这一切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和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提供了条件。因此，不论美国通过何种方式对中国重新定位，客观上，中国并不会成为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战略替代。美国统治者别有用心地渲染中国实力的上升，突出两国制度、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冷战思维空前渲染“中国威胁论”，有其国内与国际政治目的，即通过制造中国威胁，聚拢国内力量，并重新捏拢盟国。

实际上，美国是最早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的国家。冷战结束不久，美国就提出在可见未来不再面临像前苏联一样的重大全面威胁，并谋求利用这个机遇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国内两党和各种政治利益集团为争夺“和平红利”激烈争斗，对外基本上长期执行扩大美式政治与社会模式影响的政策，到处伸手扩展“美式民主”，受到广泛反对与抵制。

其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我国面临战略机遇，并不意味着世界没有矛盾和麻烦，相反，各国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任务更重。特别是，美国把中国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之一，并将今后的中美关系定位为竞争性关系，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性压力，强化了两国间的竞争性互动，也让对华政策向消极方向大幅调整。这使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对美方向上明显趋紧，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发生了根本改变或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消失，而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和战略性主动权不仅操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手里，或在有一定战略性军力的欧洲和俄罗斯手里，也更多地在中国手里了。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安全领域的战争与和平的、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发展与停滞等重大问题上，真正地发挥关键性甚至主要作用，而不再是边缘性作用。中国各领域各部门也要加快适应这一重大变化，更广泛地从全球角度考虑自身的国际和国内言论行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与美国差距缩小的同时，双方的关系必然需要做出调整，互动方式也势必会发生一些改变。这种改变过程是一个矛盾和摩擦以及利益调整的过程，不会顺畅。同时也要看到，美国近年来对外战略的调整是长期的、全球性的，不是一年两年，而会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或霸凌主义，并非仅指向中国一国，而是指向世界多国。只是中国的发展最为迅猛和全面，在美国新一轮对外战略调整中承受的压力也最大。从世界形势整体看，美国以单边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阻遏和打压，在国际上不会得到广泛认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表明，冷战以来，

目前在中国问题上出现的“一致”是不正常的和变态的，这正表明他们企图以中国问题转移国内困难和注意力，挑起空前的中国威胁论来笼络内部力量，达到各自维护既得利益的国内政治目的。美国的精英阶层和建制势力应该以对美国公众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告诉他们中国和平发展的积极成就和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外政策的真实情况，许多美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直接参与同中国的贸易和人文交往，不应该以歪曲的信息甚至编造的信息去恐吓或蒙骗他们。

更明确地说，新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中国发展的根本机遇，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是促成和平与发展大势的那些基本要素没有根本改变。世界多极化仍在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发展，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不断释放又不断孕育经济发展动力和市场能量，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能力明显提高。这都使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有较坚实的基础。

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和平，主要指大国全面卷入的世界大战与核大战，并非局部战争、地区冲突以及网络、生物、环境、颜色革命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所说的发展是以主权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在全球化市场化趋势下的发展，也就是各国、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下的发展，是全球治理不健全背景下的发展。这个世界依然有多且大的矛盾，很不安宁。因此，我国在政策和对外目标设计上，对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国际力量格局变化所引起的调整要加倍注意；对中国公众面临的诸多物质、精神问题和对外行为方面的调

整，也要遵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加强推进国家治理和公众全球化教育予以解决。要看到，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的外部焦虑和调整是比较普遍的，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后一个公开显露出这种焦虑的。中美双方应该以加强对话和合作来共同应对这种焦虑，中方也愿意更多地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交流来消除这种焦虑。但美国政客为了自身利益集团的私利来操纵这种焦虑是不对的，恶意利用更应该坚决反对。

## 二、关于我国如何用好战略机遇期 2.0 的建议

这种形势下，我国用好战略机遇期 2.0 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将是两条战线同时进行，一方面坚定坚决地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另一方面稳如泰山地推进更广泛的合作，更主动地与世界各国在共同创造机遇中共享机遇，又在与世界各国在共享机遇中继续战胜挑战和创造新机遇。战略机遇期 1.0 是一种单向车道的机遇，期间主要是外部因素为中国创造了机遇，转移了中国的外部战略性压力，我国对此加以利用即可，而新的战略机遇是和各国互动的机遇，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身的崛起和强大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性和影响力提高了，与国际社会的融入也加深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实现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全面脱钩。即使在一些领域与美国脱钩，中国也可以在其他方向获得发展的局部机会。

如果说从我党中心工作转移、开启改革开放到 21 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近十年是战略机遇 1.0 时期，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开

始全面参与并适应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用好战略机遇期 1.0 的主要方式。从 2010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 2050 年则可以说是战略机遇 2.0 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中国经济总量大幅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度和影响也空前提升，当前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重要甚至是主要角色，中国如何与世界进行互动。

这一背景下，战略机遇期 2.0 与 1.0 的突出不同，是抓住和用好机遇，需要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去共建、共创、共护和共享，中国自身如何主动作为十分重要。这个战略期发端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2010 年，完全有可能贯穿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全过程，要比战略机遇期 1.0 长，任务更艰巨，遇到的挑战也更加复杂。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更加主动作为、更加着力改革开放的机遇期；一个坚决斗争并坚持反对霸权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机遇期；一个要特别注意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给国际关系生态和人类社会形态带来的深刻变化、坚持平等包容和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的机遇期。

在这个时期，新的科技发展成果将影响全球安全战略平衡，但仍不会代替核平衡战略作用。国际社会的任务是在继续推动和平发展的同时，解决好就业和公正问题，弥补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科技鸿沟、数字鸿沟等，这些问题在国际上已讨论很多，特别是贫富差距和发展不均衡问题，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显得特别重要。中国把消除贫困作为一项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和最优先的任务并倾力完成，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在战略机遇期 2.0 时期，国家的战略性全局性任务、合作心态、包括政策策略，都可能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但目标不会变。战略机遇期 2.0 是战略机遇期 1.0 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战略机遇期 1.0 的无缝衔接。我国目前的软硬实力、战略主动性都比以前强很多，有更多条件与世界各国一起，在全球化发展中促进各国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同时，我们还要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的逆流，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要坚持不称霸，坚定反对霸权主义；要伸张国际正义，做以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同时强化对国际关系的塑造，建立包容、合作、共享的中国话语权。

为此，我国要加强对战略机遇期 2.0 的研究，这一研究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我国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判断的体会和深化，明确我国仍处在新的战略机遇中，也看清新的战略机遇的重要且不同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我们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对内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在稳中求进的同时，聚焦解决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的问题，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优势，做好抓住机遇和应对新挑战的物质和精神准备，进一步推进国内治理，加强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建设，加快集众智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要加强对国际舆论与认知的引导，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注意加强与世界各国青年一代人的交流与沟通，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旗帜，真诚突出我国外交着眼于同各国开展平等普惠合作，实现共赢共享的根本理念。

继续从我改革开放与发展的需要出发,进一步推进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欧洲国家和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关系。深化先进科技与管理治理经验的交流与吸收,加强对国际领域的研究和智库建设的投入。进一步关注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并与国际社会一道采取行动,特别是针对中小国家和全球普遍关切的问题,例如打击恐怖、防扩散、核安全控制和网络安全、移民难民、气候环境、能源食品安全、扶贫与人道援助以及疾病等。继续加强关注与推动国际合作,进一步关注国际多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改革与调整,适时提出有关合作倡议。同时,坚决揭露、击退西方以人权、民族和宗教等为借口干涉内政和推行西方价值观的霸权强权言行。发挥我国优势,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进一步加强对弱势国家,包括中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注。

(本文根据岳晓勇博士在人大国发院演讲速记稿整理,有所删改,经演讲人审阅。)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25>